

知青岁月草原情

——纪念沈阳知青下乡昭盟三十周年

何明洲 / 主编



知青岁月草原情

沈阳市浑南新区管委会

《知青岁月草原情》

主 编：何明洲

副主编：迟维意 王维实

印制单位：沈阳市印刷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辽新内资字【2005】第50号

总字数：27万 印数：800

2005年7月6日

序

按时下的风尚，出书的时候总要找人写序，据说此举是为避自我吹捧之嫌。本来也想效仿，忽然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句歌词：“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于是引出对读《毛泽东选集》的回忆。毛主席经常给自己的书写序，而且序的内容也并非自夸正文如何之好，而是对所述主题予以补充、完善，甚至还有修正。老人家的这种作法是否师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均为马、恩二人所作），已无从考证，但自作书序透出的是一种自信，所以我也自信一回。

为什么要编辑出版这本《知青岁月草原情》？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这个词。“知识青年”这个中国的专有名词起初是对中等学校毕业学生的称谓，后来专指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毕业生，留在城里工作或从事其他职业（如参军）的毕业生则不在其列。它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当邢燕子、侯隽等城里的学生在毕业后自愿到农村落户并从事农业生产时，得到赞赏，并称她们为有志向的“知识青年”。这也许是“知识分子”一词的衍生物，相对于从高等院校毕业的“知识分子”，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更年青些，于是赋予此称呼。知识青年大规模地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参加劳动是在1968年。这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很快地一股狂潮席卷而来：老三届（66、67、68届）400多万学生倾巢而出，由于当时正时兴“停课闹革命”，于是，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初一到高三的六个年级学生一同下乡的狂热现象，一时间学校里人去楼空。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十年的动乱（1966-1976）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万般苦难，给国家造成的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法制与人权遭到肆意践踏的巨大损失。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因这场劫难而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那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诸多事物是否也全部予以否定呢？这就要具体分析了。象“全国大串联”、“踢开党委闹革命”、“红卫兵运动”、“文攻武卫”、“停课、停产闹革命”等等，完全是祸国殃民之举，理所当然属被否定之列。而以卫星发射成功为代表的科技攀登，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为标志的建设成果、“三个世界”理论、计划生育政策等等，后来都予以肯定。还有一些事物则较为复杂，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严格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如1981年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所述，它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运动，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形成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必须被否定。因为它使青年学生中断学业，国家无法培养建设与发

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许多家庭备尝骨肉分离之苦，增加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创伤；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也增添了麻烦和困难，还引发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对这项运动是家庭、个人、社会三不满意，三方受害。所以，到了1979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终结。

然而，被卷入其中的两千多万知青错了吗？当年由知青们喊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错了吗？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事件，那就是由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发生的红军长征。由于红色根据地失陷，红军被迫离开闽赣苏区。当时谁也不知道红军要向何处去，包括红军的创建者但已被解除指挥权的毛泽东。红军出征后屡遭败绩，被围追阻截得四处溃窜，士气极其低下。但是，当时的红军将士们错了吗？没有，红军没有错，而是指挥红军的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错误决策，使红军开辟的大片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使长征初期的红军被动挨打，伤亡惨重。即使是这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仍然是红军将士们的追求与精神支柱。红军精神没有错！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的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路线，并决定恢复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对红军的指挥权。于是，红军长征有了方向：北上到陕北红军根据地去，为挽救民族危亡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于是，红军长征战绩辉煌：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过雪山，跨过草原，腊子口大捷，吴起镇会师等。当红军跨过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在他的

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用充满感情和激情的语句写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多亏有了遵义会议并推出了正确路线的集中代表人物毛泽东，才使长征成为一部世人赞颂的壮丽史诗。

知青没有红军那么幸运，而且这场不幸的导演偏偏是当年引领红军踏上幸运之路的毛泽东。知青中不乏思想家，遇罗克就是一个，可惜，这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到手的知青，被一些阴谋家借用“文化大革命”的屠刀砍下了头。即便是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艰难困苦中，大多数知青仍旧胸怀与人民共患难，为祖国献青春的志向并在广阔农村坚持着。所以，知青没有错，错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决策者。当这位错误决策者带着“七分正确、三分错误”的定论逝去后，一位也被卷入“上山下乡”之中的人最终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不过他不是“知识青年”的一分子。由于他年青时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当了红军，而且全程参加了长征并在遵义会议上列席旁听，权且起个新称呼：“知识红军”。这位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的农机修造厂劳动改造了三年的“知识红军”老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救两千万知青脱苦难，邓小平救十亿中国人出苦海，所以人民说，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拨乱返正是第二次解放。邓小平作为上过山、下过乡的人，对知识青年是如何评价的？记得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看来，还是扛过枪、跨过江、下过乡的人靠得住。”“下过乡

的人”指的是谁？从总体上看，非知识青年莫属。联系起“扛过枪、跨过江”两句，战争年代扛过枪的人很多，而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的也不只是志愿军，还有不少支前民工，但就主体而言，显然指的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志愿军们。

知识青年不用再下乡了，已经下到农村的两千多万知青迎来了打破常规的1977年12月份举行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可惜，由于基础差加上荒废的时间长，只有27.5万人（主体是知青）成了幸运儿。1978年之后，所有在农村的知青陆续接到通知返回城市并被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了。不经意间，“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倡议摆在了新一代大学毕业生面前，时间是1983年，距1978年仅仅五年，还谈不上斗转星移。号召大学毕业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北地区去，到边疆去，到老少边穷地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次又错了吗？没有，绝对没有错。西北、边疆、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绝大多数是农村），最需要加快发展，否则就会拖全国实现四化、实现翻两番、实现小康的后腿。而发展最需要的是人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再一次被响亮地提了出来（当然，这次与“文化大革命”有着本质的不同）。由此可见，当年广大知识青年拥有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参加建设与劳动的奉献精神没有错。

1983年，已大学毕业一年多的我在沈阳化工学院任团委书记

记。这样一个角色要求我参与动员毕业生去边疆工作的事宜，结果一些同学当众将了我一军：你毕业时怎么不去边疆而是留校留城工作？我当即答道，当年在比各位还年青四、五岁时，我已经去过边疆，在内蒙草原生活了近四年；如果现在组织上批准，我仍然可以和大家一同前往。这年的毕业分配方案中有去青海省的名额，许诺干满八年后调回内地。多亏我曾有过近四年下乡草原的经历，否则真是下不来台。其实，1982年初我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首届大学毕业生的一分子，在填写毕业志向时，只填了“去工厂”一项，面对工作地点一栏，填的是“哪都行”。当时，学院党委执意要把我留在学校做政工干部。记得我读到二年级末时，学校党组织就曾郑重地找我谈话：“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挑任何一所文科大学，学院出资送你去学习，毕业后留校做政工。”我拒绝了学校的安排。我喜欢学理工，我必须把专业学完。可是临到毕业，学校还是抓住我不放，不许我报考研究生，不按期将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尽管我的预备期已超期半年多）。在当时的气候下，我只得服从组织需要留校工作。在向同学们讲了我上述经历后，他们理解了我，一些与我关系不错的学生干部主动带头申请去边疆，并带动了一批普通同学。送走了毕业生，我们学院团委又组织在校青年大学生，利用暑假回乡或下乡，去搞社会调查，同时利用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为民服务，参与改革与建设。我们认为这符合“五四”运动以来，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并称之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1984年5月，由于辽宁各高等院校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取得成绩，团中央在沈阳召开了“全国高校共青团工作观摩座谈会”。虽然沈阳化工学院团委和我本人都是这项活动的创始人和参与者之一，但是起初大会既未让我校出经验材料，也未安排到我校观摩考察。到了要去各院校现场观摩的前一天的下午三时多，大会突然找我索要未上会的“经验材料”，不久后又通知我：明天上午，主持此次会议的团中央常务书记胡锦涛同志亲率四十多位高校团干部和诸家新闻单位到我校观摩。第二天我院迎来了大会观摩团。说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与大学生们一起走向农村、工厂开展社会实践，也得益于我那段下乡昭盟的经历。因为草原生活使我知道了，人民群众那里有许多值得青年人学习的东西，老百姓也需要青年知识分子送去科学与技术。到了1997年，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经过十多年的深化与发展，形成青年志愿者“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形式。今年是2004年，7月20日，温家宝总理致信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全国大中专学生：“看到你们参加2004年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消息，甚感欣慰。你们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大学生走出校门，走进农村，在同农民接触中，会进一步了解国情，懂得社会，认清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会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培养实际工作能力。这将对你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希望你们把这项光荣而有意义的活动坚持下去。”

由此可见，不论什么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发

与建设农村，都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值得称赞和提倡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八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不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富裕与发展，国家就不可能进步与发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仍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绝不能搞运动，闹停课，废学业。为了纪念我们到农（牧）区插队落户三十周年，也为了弘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我们才编辑出版这本书，既献给我们自己，也献给那些继续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而奉献青春与知识的后来者。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去当年的昭乌达盟如今的赤峰市地区下乡的知青，对昭乌达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又使得凡是下乡到昭盟的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感群体。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昭乌达盟原来隶属内蒙古自治区，1969年划由辽宁省管辖。这种划转也有一定道理。从历史上讲，昭盟与辽宁省同为辽代属地（辽，与宋朝同时期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07-1125年），它的东京道（相当于现在的省），首府在现今的辽阳市附近，西京道首府在山西省大同市附近，中京道首府在宁城县附近，南京道首府在今天的北京市附近。在地理方面，辽河的主源头之一在昭盟的克什克腾旗，流经昭盟的这一段叫西拉木沦（即“黄河”之意），到了哲里木盟（现今的内蒙古通辽市），叫西辽河。西辽河在辽宁省康平县北部与东辽河汇合后叫辽河。在经济方面的关联更多：铁路均归沈阳铁路局管辖，电力统由东北电业局调度，航空也同属一家集团公司。

虽然昭盟划归辽宁管辖，但是在1974年8月以前的五年里，尽管辽宁省有不少机关干部走“五七”道路到了昭盟，却从未安排过知青到昭盟下乡。只是在昭盟还未划入辽宁的更早的1968年，有沈阳的马英等四名同学到昭盟的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插队落户。1974年的中学毕业生是一个面向，即全部到农村下乡落户。在省里有关方面的引导下，大连市的毕业生王冬梅等同学率先提出了到昭盟插队落户的倡议，这正符合辽宁省开发西部、建设昭盟的历史要求，也符合国家把昭盟划入辽宁管辖的意图。于是乎，在全省的大城市掀起了“到昭盟去”（替代了“到边疆去”）的浪潮，从1974年到1976年，共有一万多名知青开赴昭盟。

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昭盟各族人民，胸怀博大，真挚纯朴，热情地拥抱知青儿女，他们在生活上关怀知青，在生产上帮教知青，在感情上慰藉知青，与知青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知青们尽管只有十七、八岁，但他们尽己所能为当地的发展与建设出力。他们带来了文化知识，带来了青春活动，带来了外界信息。虽然只有两到四年的共同生活，彼此却结下了深深的友谊。1978年，所有在昭盟的辽宁知青拔点回城，1979年，昭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由于分属两个不同的省（区），昭盟似乎又变得遥远了，变得神秘了。然而，她在下乡昭盟的知青们的心目中，份量更重了，思念也愈发强烈。由于当年下乡时去的是省内的一个特殊地区，而且前两批即74届、75届知青是采取自愿报名、组织审核批准的方式产生，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去昭盟下乡标志着勇

气和毅志，有人甚至说：敢去昭盟下乡本身就是英雄行为。如今的昭盟又归入了内蒙古大草原的概念，使得人们对去昭盟下乡这件事，对曾在昭盟落户的知青，总是重看一眼。正是这种特殊的情愫，导致这些知青比下乡别处的知青更具有亲合力，到了一定的纪念日就要不分青年点和旗县，聚集在一起举行活动。

今年，是辽宁知青下乡昭盟30周年纪念日，自然是一次大庆，于是在举办了纪念活动之后，还编辑了这本书作为永恒的纪念，这里有我们的青春岁月，也有我们的血泪与希望，对我们的后代和其他年轻人也许会有些价值，但愿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成为他们、成为社会的一份共有财产。

何明洲

2004年9月5日

往 昔 篇

蘇 音 弁



1974年8月8日，沈阳市大雨倾盆。何明洲就是持这张介绍信，到位于八一公园附近的市少年宫报到参加了赴昭盟创业队学习班。

（何明洲提供）

